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四期 ——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8c)

---

- 【书刊动态】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出版消息和序言 丁 东·周良宵·顾菊英
- 【不堪回首】 我的“低种姓”生活(摘录) 章立凡
- 【读书笔记】 “民间文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读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有感 李 乾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书刊动态】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出版消息和序言

• 丁 东·周良宵·顾菊英 •

◇ 丁东：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最近，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妇完成了一项篇幅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的编撰工程。他们就是今年78岁的周良宵先生和75岁的顾菊英女士。他们夫妇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是元史和蒙古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晚年转入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李慎之生前曾力表支持。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长达600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并于2008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这项成果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约250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约300万字，共收录文革期间“中央首长”讲话1100余篇。第三部分是《十年文革大事记》，50余万字。前两部分是光盘，第三部分是纸质书籍。《十年文

革大事记》前，有作者撰写的长篇序言，表达了作者对文革的痛切反思。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与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

值得称道的是，讲话者既包括毛泽东和被官方否定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也包括被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者不以官方结论划线，为尊者隐，而是一概收入其中，体现了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良史品格。

#### ◇ 周良宵·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但由于1969年4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目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大事记》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种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加上1969年5月至1976年10月6日的简要纪事，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同时，我们也把《系年录》和《传信录》两本资料集作成光盘，随《大事记》发行，以利有需要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深信，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 ◇ 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序

这本书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三年多、也即是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的编年纪事集。它是一本实录体的原始资料汇集，目的是尽可能的保存那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材料，尽管现在人看起来，荒唐、横暴、无法理喻，而当时的群众就是根据它的精神运动的。如果不通过这些横暴荒唐的材料，后来人又怎么能够再了解这亘古未有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呢？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政治风暴和灾难，是留给中国人不容忘却、亟需深入总结的复杂课题。它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应该严肃地指出：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与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以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与发展而来。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如是而已。）是其无尚权威的彻底破产；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浓疮的全面溃烂，

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最终破灭。不单止此，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于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6年春，行将就木的毛泽东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解放并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是发动并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把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成自己最伟大的创造与勋业来自诩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推卸罪责的说法都只能是掩耳盗铃，欺骗不了人的。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作为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的辨白，更只能是一个用常识性辞语错误进行诡辩的低级玩弄。毛泽东本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既深且钜，罪责难逃，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深入一步来检讨，我们就绝不能局限在指明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要揭露和批判产生暴君与虐政的政治制度、理论体系，乃至使它赖以生存和肆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中也包括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堕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神化了的暴君，而又为什么当他标新立异、一意孤行时，在上则群僚奴服，甚至在挨整致死时，仍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下则数以亿计的人们，疯魔般地发动起来，为保卫一条自己也弄不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竭尽愚忠。详细来检讨理论、制度的谬失和社会的痼疾等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十分严肃、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历史课题。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象某些破落的阔少所理解的单单是弘扬与继承祖辈的辉煌与荣耀；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反省和批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落后的祖国来说，尤其更应该反省和批判：为什么“地大物博”而又无力自强？为什么别人起飞而我们却在倒退？为什么专制主义在中国至今不得肃清？不能反省和批判的民族永远只能是落后、最终难免于灭亡。能够反省和批判才是我们民族扬弃落后，自新自强，迎头奋进，跻身于当代进步潮流的起点。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一次最彻底的暴露。抓住这些病征找出病因，痛下针砭，沉疴才有可治之望，中国才有得救之期。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至今仍视同禁区。材料禁止流传，立论必依《决议》。为了一己的固权保位，讳疾忌医，置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于不顾，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气愤！历史难道是可依靠禁毁而遗忘，可利用一纸决议来任意涂抹与捏造的吗？

正是有鉴于前述的原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闯这一禁区。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抢救和保存并初步整理将濒于绝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有的朋友听说我们从事这一课题，不无揶揄地取问说：你们能得到中央的档案和内幕吗？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老实承认，完全不能。我们收集到的只有、也只能有当时流传在民间，人各皆知的资料。我们所能作的只能算是一部野史。但是，正史从来就不能取代野史，正史从来就必须靠野史来映证。发生在当时民间千奇百怪，常理难明的事件也完全不是官牍、正史所能包容。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些民间的资料，就根本不可理解和恢复当年文化大革命诡异和复杂的社会面目。谓予不信，可以把当时的官方权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找出来翻翻。那上面除了应该认真看待的堂皇而隐晦的社论与评论员文章之外，其余充斥满版的，半出谎言，半出伪饰，许多事实真像却是半点也看不到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一个例子。公开的报导尽是撒谎，内部的档案谁说又都是可靠？再说，今天我们连明清的档案也还不能充分自由利用，那么，等待文革档案公布，这又将是何年何月才能盼到？至于说谋发东窗，施行诡秘的拜占庭式宫廷阴谋，从来就是不会形诸官方文牍的，恐怕即使有朝一日档案公布了，也仍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宗皇帝实录》我们今天是还可以看到的，但找得出“烛影斧声”的半点蛛丝马迹来吗？如果没有了野史，历史岂不更成了胜利者的独家消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不同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编发小报、传单，对机关单位及其领导人进行揭露、批判。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成

天忙于没完没了的接见、讲话，这些材料也不胫而走，在全国风行。由于那时候严格保密控制被冲垮，一些原不能为普通人所可接触的文件、决议、指示也纷纷在社会上曝光。甚至一些党内最高的机密案卷也公开流布。所有这些材料（其中当然杂有废品），究竟实有多少，谁也无法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已大多毁佚了。一些图书馆的收藏则被限令销毁。几个大的图书馆里据说收藏甚富，但不允许借阅，更禁止复印。因此，我们在搜集时已经是困难重重。在全靠亲朋至友的帮助下，虽穷十数年之力，所得也止于此，离开实际甚远，实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了解我们今天情势的读者，是能够谅解这一点的。好在本书的结构很灵活，将来有了新材料，发现了错误，增删补改，都很方便。我们也深知，这一项工作原不是我们两个人、也并不是一次修订就可以满意地完成的。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如果我们自己来不及作进一步修订，则谨以待后之能者。

下面，我们就编纂中的条例事项作一些必要的申明，以利于读者的利用。

一、文化大革命究竟应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结束？其间怎样分期、分段？国内外的学者多有分歧。本书包括的时间是1965年11月至1969年4月，纯是从可收集到的资料着眼，没有更多学术上的考虑。其中分编、分卷，也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以便读者利用；每卷所该的时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在标题后载明，也是为便利读者查找。

二、本书逐日记事，就事而采录有关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原始资料尽可能全文照录，参考资料则多重点摘抄。据实录存，完全不论其中的观点是非。

三、本书记录，主要限于北京地区的运动情况。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有关全局和具有某种典型性质的事件、可资参考者，也间作记录。至于各省市运动的具体情况，当各有专著，决非我们这一种综录之所可得而详。

四、对书中有关人物的臧否、事件的评鹭，将是后来研究者的课题，我们的责任则是如实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本来面貌。显然，它们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是在取舍，编排上是贯彻了我们的意图的。

五、原始资料中，传抄翻刻，鱼鲁亥豕之处实多。不同版本也往往面目各异。我们只能择善存之，且一仍旧貌，尽管它有时文义难通。

六、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的平反、定案和批判、回忆的著作，对事实有所补充，错误有所订正，或有助于后人了解情况者，我们也间或作为附录，加以摘引。但是，它们同样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七、在某些地方，我们作了些按语，主要目的仍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但也有有的地方，间出己见，有所议论，亦情之所至，姑妄言之，痛定思痛而已。

八、由于材料的阙佚，一些事件被遗漏、甚至发生错误，实所难免，切望读者不吝教正，以利修订。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要谨以至诚感谢所有真挚、热情、无私和关心我们这一工作的朋友，是他们慷慨的赐予我们多年珍藏的资料，提供一切可供利用的条件，大大的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有的朋友帮助我们通校原稿，提供修改意见。没有他们，这一工作是绝无法完成的。碍于时势，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把他们名字列出来，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情谊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与本书同在，与天地共存。

◇ 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序

传信录者何？乃源源本本辑录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首长讲话之文，以传信于后世也。

巴金老人在历经磨难之后，沉痛的告诫人们要讲真话，他还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给文革讲真话。讲真话，自然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的，谁反对谁便是赞成讲假话，专以假话谋生的骗子也是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冒暴露自己伪恶真实原形的危险的。对文化大革命嘛，上自当今权要，下迄市井凡人，一致斥为“浩劫”，敢于公开为其辩护的人，也是几乎没有的。然而，巴金老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为文革说句真话，以昭告国人和后世的意见却实际上被封杀下来，至今如沉大海。原因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当局者们害怕，至少是不愿意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讲真话。这一点，从当局对文革的研究和对有关著作的严密控制，就是不争的明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泯灭的手段，来制造忘却。并以清理为名，销毁关于文革的材料，并严禁其流传，也是这个政策的有力证明。

然而，我还是有记忆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年六·四天安门硝烟未散、血渍未干的时候，一位号称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让大家忘却。我的心凉到了冰点。我仿佛看到了在慈祥的老外婆背后拖着的狼尾巴。为凶犯拭尽屠刀上的血痕的人，不是同谋犯，也是有意无意的帮凶。这一点，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服膺巴金老的号召，主张讲真话，然而，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见诸当时社会上的传单，记录本有差异，搜集又不可能周全。所以，除了肯定多有缺漏之外，语义不明、文句错讹之处更是难于仆数。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我们当然无权作任何加工修改，一切都保持旧貌。这，也算是存真。

~~~~~

## 【不堪回首】

我的“低种姓”生活（摘录）

• 章立凡 •

三，师生之间，筑起心防

韩愈《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我从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

那时已开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

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着“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气宇轩昂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她曾经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入学后安排我当外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自愿当了美术课代表。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很喜欢我，有一次他安排作业，题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当作业交了卷。父亲的丰富藏书和文物，也被收入画面。吴老师将作业作为示范，在本班展示，画中的人物和陈设引起了同学的议论。那时已很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从此打上问号。

学英语学到“Capitalist”（资本家）这个词，于是有同学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来取笑我。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

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

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于是王老师某日找我谈话，嘱将平日所读之书，开列一个单子，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之用。我老老实实在地将所读的书写成一个不短的书目，交给了老师。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

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

虽然父亲表示会支持我上大学，但我自己清楚，凭“出身”论“表现”，哪个最高学府都不会敞开大门。于是率性自为，读杂书，画山水，练习书法篆刻，完全按照旧时文人的方式生活，与这座著名工科大学附中的学习气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我爱读书，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但那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无用武之地。

我保持着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读了王力教授的《汉语诗律学》以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处，于是苦心钻研，但对于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字，总是难于识别。古代诗词韵辙依据的主要是“中州原韵”，相当于古代的河南话，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难以掌握。某日试着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话来识别，忽然顿悟，原来“吴音”是有入声的，很快就辨别清楚了。后来我读诗词有了一个新习惯，开卷先辩格律，渐渐发现毛泽东诗词有许多不入律处乃至诗病。但那时已学乖，这种发现不可与外人道。

学乖还不止于保守内心秘密，自从有了被批判的教训，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几分圆融，不再锋芒毕露地与人争论。王老师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语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于是开始设法弥补，曾安排我在课外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解诗词格律。师生关系恢复了平静，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师私下向我透露，当年她曾请示万邦儒校长，在万校长的指示下，于某个教室中举办一个不公开的展览，将我所作的诗词全部展示，作为本校“阶级斗争”的例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作为“反动学生”与韩家鳌副校长关在一起，他也证实有此事。

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我怀念师长给我的教育和知识，但永远诅咒整人的歪理邪说。

#### 四，“不准革命”，乐得逍遥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这几年思想领域大批判不断，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翦伯赞、罗尔刚的史学观点等等。我为了看个究竟，便找来那些被批判的书籍文章阅读，结果发现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周谷城为了捍卫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对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评，但报纸不登，于是有李平心教授出来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称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我偷偷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学术观点，及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后来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权力斗争而非学术之争，庆幸没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作“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以刘晋、章建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

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沦为“低种姓”贱民的一员。

我那时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

回家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父亲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个自由散漫的人，贴大字报只是为了争取发表意见的权力，而不是想掌什么权。既然“不准革命”，难道还挡得住阿Q当“逍遥派”？从此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

五，“混蛋”逻辑，“基本如此”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的身心内外，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

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着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并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据说新“国防绿”还不够资格，褪色的黄军装（俗称“屎黄”）才能显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来“屎黄”又被认为家庭地位不够，改为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主张“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以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开始用肢体代替头脑。赤脚勉强可与“野蛮其体魄”沾边，孰料连头脑也被野蛮化，非但“国骂”盛行，不久皮带也成“国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毁灭文明的“革命”。

红卫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组，还先后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工作组负责人刘晋回校作检查，另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礼堂斗争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记得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头头质问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资本家”，言语间似乎又矮了一截。红卫兵头头责令他跪下，胡迟疑了一下，全场狂呼口号，于是他只好从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对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胡克实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险公司的掌门人，思想开明进步。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胡先生也参加了。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时，胡先生悄悄为他雇了一名保镖，但不让他本人知道。父亲强调：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不是坏人。

不久开始放暑假，那时已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



“基本如此”。我当然不赞成此对联，但已没有兴趣去辩论，因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着乱掺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鼓动，会场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世上有几人乐于唾面自干，承认自己是“混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歌当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场，好容易熬到终场，便抽身“滚蛋”。由于“对联”遭到普遍的反响，不久出现了一种“出身不红”但“靠拢革命”的学生组织，称为“红外围”，我对此毫无兴趣。

多年后，我与当年主张“对联”的中心人物谭力夫相识，他那时已改名谭斌，踌躇满志地出任康华公司副总。我曾有意探讨一下这段历史，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不想扫他的兴。“对联”衰败后不久，他自己及其红色家庭也成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体制和教育长期形成的恶果，不是北工大学生谭力夫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

## 六，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老人家后来总结说，“一生办了两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办成时，他在这里主持了开国大典。据说大典之日原定为1950年1月1日，老人家改为1949年10月1日，即夏历丁丑年的甲子日。这个日子选得不错，本共和国至今已度过五十个春秋。这回发动“文革”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错了皇历。古来年值“丙午”、“丁未”称为“红羊劫”，当天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将八亿中国百姓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成为伟大领袖一生最大的败笔。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就是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国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丧命。

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诉，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获得无上荣光，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

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不要打人”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受围攻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七，再入重围，闯关而出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

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我在校已是有名人，他焉有不识之理。不过我当时的走路的气势，似乎将他震慑住了，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周围，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数日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表明要遵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再采用武斗办法对付阶级敌人。由于本校红卫兵的声望和影响力，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着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数年前某位成为名作家的红卫兵领袖，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闻之令人绝倒！莘莘学子无端地相互残虐，责任或可归咎于时代，但当事人若毫无反省之意，甚至抹杀历史，不知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右翼有何区别？据说作家属于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品类，但我怀疑其中有赝品。

## 八，万千惨景，一堆烂账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已另文记述）。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由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全国被从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1）其中北京市85198人。（2）后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灭绝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过手段更加残酷。我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儿子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3）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有多少人死于冻饿，则更无从查考。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拆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奉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

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太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没收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币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28.8亿元，金银饰物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北京市没收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4）另据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万多户，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5）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这些公民的合法财产，“文革”结束后虽有政策予以发还，但十补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难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没人敢向国家追讨这十年的房租；廉价处理的财物，不会按原值补偿；黄金折价发还，原物仍躺在国家金库；本主已死无人认领的，自然成为死帐；而由于帐目混乱、经手人中饱或被人冒领的，则更是有去无回。

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一封长第一封信中，对“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有如下评论：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 九，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说过自己“红八月”经历，再说周边友人。父亲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叙述了，我要讲的是两个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人家。不过那时“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将资本家、黑帮（走资派）补入，这两家也许勉强可以入围。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6）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在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

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娇小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高级民主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止，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

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少女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十，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早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依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麟〔7〕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8〕、陶家瑶〔9〕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改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纪江南寇祸惨象曰：“月落儿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姑苏城外寒山尽，夜半枪声到客船。”并与李根源、马相伯〔10〕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长彭真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讯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11）；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朦朦胧胧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XX号顾乃文”，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一乃一文？他死了！”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户，仅图书、字画、文物就抄没十七万件以上。（12）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在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最终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像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像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 十一，私设公堂，“群众专政”

那些年流行一句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却不肯领这份情。周恩来等革命前辈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见那种教育的后果还是不错的。但此时什么才算做“教育”，谁又有资格“教育”别人，就很难界定了。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倒是体制中有许多封建主义。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着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着白霜和冰凌。

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三四个人围着我，像围着一只拳击沙袋，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盖源于此。

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晃如白昼。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教训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

过去校领导整我，我也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真草隶篆都写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过，“文革”爆发后被扔在一间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捡走作为收藏。他以前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韩家鳌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韩校长则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

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作为锅炉房运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进入女厕所，就在此时。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

“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工宣队”的一位年轻女工，比我大不了几岁，见面总是盯着我笑。“书生落难”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几分得意。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着若是那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完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

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会后准备回家，那位揭发我的同学悄悄向我解释说：“我揭发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回答，心里想的却是犹太之吻。

十二，天道轮回，谁来宽恕？

从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家庭。伟大领袖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使尽之后，便被牵出来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愤。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无意中踏进一间空教室，只见墙头笔墨淋漓地题着一首“反诗”，分明是要“上山打游击”的口吻：

熊熊鬼火照天烧，倒走横行尽魔妖。  
乱世方显男儿志，抛却书箱进山坳。

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

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揭盖子”所拔的头筹。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

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清华园的“水木清华”后面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

“老兵”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当，起来揭发继母王光美。及至父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耗尽。此时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刘涛曾向我谈及被继母禁止参加父亲追悼会，言下极为伤感。我相信刘涛无非是年轻无知，被政敌所利用而已。她没有不可饶恕的罪，错在伤害的是继母。

我想起了胡风，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经人大常委会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权。胡风与夫人梅志于1955年5月17凌晨被捕，18日人大常委会才开会批准逮捕胡风，没有委员对违宪捕人提出质疑。当时的委员长刘少奇也不会想到：十二年后他身为国家主席，竟然也无法用宪法保护自己。

天道好还——“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我相信中国革命之子刘少奇被绑在临终前的病榻上时，除了不可饶恕者以外，一定会原谅全国无数伤害他的人，其中肯定也包括自己的爱女。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也曾是一名伤害者。

二十世纪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永远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换来了没有君主的专制。二

二十世纪中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换来了新的国家和宪法。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却被主持制定者肆意践踏，连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尚不能幸免，遑论我等芸芸众生。

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国人束发受书便知，不过知荀子另主“性恶”之说。推翻千年旧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载，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性恶”被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顶峰”。率兽食人者倡之，助纣为虐者从之，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狂野酷烈的历史画卷，足以独步古今。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内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以往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注释：

1，《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2，参见丁晓禾编着：《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3，《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4，《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5，参见丁晓禾编着：《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6，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羨意，字基赞，广东开平人，1868年4月3日生。1880年去美国，在旧金山中国餐馆当帮厨。1883年加入洪门致公堂，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斗争。1904年起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在美负责致公堂、安良堂等侨胞团体的工作。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后，被推举主持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祖国抗战。1941年冬，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议员。1945年3月，当选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1946年4月，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国参加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并在上海任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爆发后，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在香港以洪门老人身份支持陈其尤等人改组致公党，赞同致公党参加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上书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赴美发动华侨支援祖国解放战争。1949年9月回国，出席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1955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7，张一麟（1867—1943），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袁世凯之召，任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曾经竭力反对袁

世凯称帝，不肯在“劝进表”上具名。改任教育总长。1921年退隐乡里。1937年与李根源、马相伯等发起“老子军”抗日。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会员，1943年在重庆逝世。

8，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署高黎贡山人，云南腾冲县人。1898年中秀才，1903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曾任北洋政府总理，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隐居苏州。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一麟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1949年以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

9，陶家瑶（1871—？），字星如，祖籍绍兴陶堰南野堂，生于南昌。清朝贡生。曾任四川补用道和四川盐运使。1914年任民国政府长芦盐运使。1918年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23年任江西内务司司长、北京政府财政部整理赋税所议员，同年3月任江西省省长。1926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928年去职，曾寓居上海、苏州。

10，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以字行，晚号华封先生，江苏丹徒人。1862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1939年11月4日病逝于越南谅山，享年100岁。遗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11，周瘦鹃（1895—1968），江苏苏州人。幼孤，靠母针黹收入维持生活。在上海民立中学就读，毕业后留校教课。开始着译小说，结识编辑包天笑，得以成名。加入南社。进中华书局，译《欧美短篇小说丛刊》，是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译者，曾得到鲁迅的赞赏。1920年，进申报馆编辑《自由谈》、《春秋》副刊，又为中华图书馆编辑《礼拜六》杂志，为大东书局编辑《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等杂志。1939年夏参加上海中西莳花会，以二十多种盆栽参赛，得荣誉奖。次年又获全会总锦标。辞去申报馆的编务，回苏州辟紫兰小筑，从事园艺事业。抗战时期，避难上海，以售卖盆栽为生。1949年后回苏州，专事经营紫兰小筑，并参与苏州园林的修复规划设计，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12日投井而死。着译有50多种。主要有《拈花集》、《花鸟虫鱼》、《瘦鹃短篇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等书。

12，《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

## 【读书笔记】

### “民间文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读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有感

• 李 乾 •

兴味盎然地一口气看完了曹承义先生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

有朋友说这本书让他又一次重温了武汉的文革史。这话当然有道理，武汉文革的重大事件不少在书中都有他作为亲历者的述说。但我在看此书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看到一个心存公平、正义、无私和勇敢的草根年轻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对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所发出的呐喊和抗争，从而揭示了当时已客观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也是当时文革能够让亿万群众奋不顾身

地投身其中的根本原因。这本书的语言朴实无华，但却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被某些人千方百计想歪曲的一个真相：当年造反派的领头人大都是被那些迫害和欺侮人民群众的官僚们逼上梁山的。他们中有的是多年来一直存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而在文革中一开始就受到迫害，有的虽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但少有表露，以品德端庄、工作能力强而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但见到某些不平事后终于难压心头之火出头仗义执言而被视为“眼中钉”，而被打入另册，曹承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泯灭良知而求得个人的腾达和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不平则鸣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当然他也就选择了苦难和厄运，这也是古今中外太多的志士仁人的宿命。让人钦佩的是在苦难和厄运面前曹承义先生始终保持了豁达和平静。

十年文革，除了1967和1968两年造反派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外，其余8年时间他们一直处于被各式各样的官僚集团镇压和迫害的状态，这种迫害和镇压在1976年后的几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被肆无忌惮地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的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自杀或枪毙）的数量恐怕在全国范围内是个永难见天日的天文数字。

曹承义的这本回忆录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在理论界有“两个文革”一说，说那个年代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文革，一为官方文革，一为民间文革。官方文革的目的和民间文革的目的是有本质的不同。官方文革是达官贵人们的宫廷斗争的一种演义，民间文革是草根们自身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一种诉求。这两个文革在那十年中有一个短暂的重合，由于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民间文革很快为官方文革所不容，被栽赃戴上一个“5·16”的帽子血腥地打了下去，官方文革对民间文革里有自己独立见解的领袖人物更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两个文革的说法我一直是深以为然的。

曹承义的这本回忆录就是民间文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现在对某些在思想深处一直在用文革思维行事的权势者来说，面对文革他们是左右为难：不否定文革，他们曾经的某些作为就会没了依据；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又会否定他们自身，他们的理论基础就需要推倒重来。在面对两难时把否定文革变成妖魔化造反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但这只是一个只能在一个短时间可以起作用的“创意”，在这“创意”失灵后把文革设为禁区，这是一着注定要落恶名的臭棋，一个拒绝反思的民族恐怕不是一个能在经历了历史灾难后能真正重新站起的民族，一个拒绝反思的政府恐怕也不是一个能有大为的政府。为子孙后代计，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留下我们亲历的真实的历史。

曹承义的回忆录就是这样一段他所亲历的真实的历史。

以工宣队进驻清华园为标志，民间文革意义上的文革厄运开始，至今已有整整40年了。这40年里厄运对造反派来说一直是如影随形。好在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文革的参与者现在都有了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意思的是在当年参与文革的两大派中现在只能看到造反派写的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大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光彩，当然也不难看到他们的幼稚和无知；那些各地的最终成为胜利者的保守派的头头们却好像是羞于动笔，是乏善可陈还是没有底气？真还搞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大都少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是被官僚集团组织和操纵的，以武斗和迫害人见长而难以示之于人。这是没有疑问的。

其实文革中的两派相互间的仇恨是被人别有用心地煽动起来的，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叫做“分裂族群”。一个被仇恨煽动起来的社会是没有宁日的，注定面临的只会是灾难。谁能从这种仇恨中得到好处？肯定不是处在这个仇恨中的草根，不论哪一派中的草根，都是这个仇恨的重度受害者。真希望能看到当年保守派的朋友中有人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写下那段历

史，没有你们的参与，历史就不是完整的。

文革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人类对于自己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一个不断探索、没有终结的过程。

在40年后回首文革时，我最想说的是：文革是一个用非法制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非法制的社会里必然出现各种弊端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论那一派得胜，都会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都不可能看到自己所期待的那样一种社会状态出现。从文革中的两派来说，最后是保守派胜利了，胜利了又怎么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得到了什么？如果上帝打了一个盹，让1976年是另外一个变局，造反派中的绝大多数的下场会比现在强？也许有人这样想，反正我是绝不信的。

但任何“革命”都会留下遗嘱的，遗嘱的执行人很可能是反对这个“革命”最坚决的人，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文革也再次证实这一点——这里的“文革”，是民间意义上的“文革”。遗憾的是上帝在关键时刻真的打了一个盹，让那个反对文革最坚决却是文革遗嘱最有力量的人在最后一刻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一本叫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著）的书告诉了我这个信息。

历史是不是很吊诡？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